

契丹

裴元博 陈传江 著

「契丹文明解读丛书」

钱树是指未加工的古代铸币半成品，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神秘的契丹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难解之谜，每一件契丹文物现在都是奇珍。难得一见的契丹钱树真实记录了这个伟大的草原民族的光辉历史，弥足珍贵，极具研究价值和投资潜力。

钱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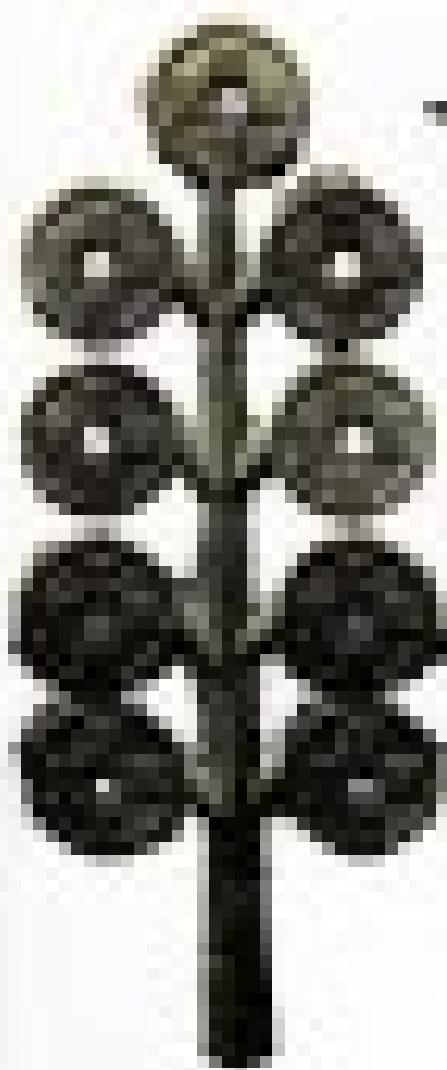


鉴赏与投资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契丹

铁树



铁树（Scaevola taccada）
铁树（Scaevola taccada）
铁树（Scaevola taccada）



契丹

钱树

鉴赏与投资



契丹

裴元博 陈传江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丹钱树鉴赏与投资 / 裴元博、陈传江著.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98-2678-3

I. ①契… II. ①裴… ②陈… III. ①契丹—金属货币—鉴赏—中国—图录 IV. ①K87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1612号

特别声明

书中载录之所有艺术品(藏品)及文字,系作者或藏品所有人为说明或补充说明内文而提供,仅作展示参考之用途,本社不承担其真伪、瑕疵及市场价值的认定和担保责任,敬请读者谨慎注意,特此声明。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契丹钱树鉴赏与投资

裴元博 陈传江 著

*

安徽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3.5

印数 1—4000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8-2678-3

定价: 78.00元

前言

所谓“钱树”，是未加工的铸钱半成品，指一炉所出因未曾鑿切而与槽铜连成一体的一串钱，看去仿佛枝叶对称的小树，故称“钱树”。

近年，笔者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等地收集到数百种中古时期历代契丹政权所铸“钱树”实物，有金、银、铜、铅、锡五种材料。我们感到这些“钱树”对研究历代契丹政权的货币制度、铸币历史、铸币技术都是不可多得的见证物和参照物。考虑到“钱树”的文物性质和研究内容的特殊性，笔者特地单独编撰成书，辅以笔者对契丹铸币制度及铸币技术研究的心得集结成册，以便于对契丹铸币制度和铸币技术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研究。

契丹族在中国中古时期曾先后建立了大贺氏契丹汗国、遥辇氏契丹汗国、耶律氏契丹帝国，以及西辽、后西辽、东丹、北辽、西北辽、东辽、后辽等多个国家政权，雄踞中国北方近千年，为中国北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在古代汉族文人眼里，契丹民族始终是个茹毛饮血的野蛮民族。出于民族歧视的大汉族主义则进一步把契丹民族丑化矮化，加之契丹统治者对契丹文化输出的严格控制，更加深了汉族同胞对契丹民族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和误解。自金代以后，原契丹故地离汉民族越来越远，到清代更被封闭三百余年，这一切更使契丹成为一个遥远而神秘的民族，其文化更因人罕闻其实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契丹钱币史要根据新世纪出土的钱币实物去改写，一切有关契丹钱币的观点必须在契丹钱币实物的研究中重新认真提炼。钱币研究的新成果必定改写契丹的历史，一个真实的契丹必将在新的契丹钱币研究中重生。

契丹历代政权钱树的出土与面世，将对某些历史学家对契丹钱币上限问题的错误认识给予纠正，对钱币界至今没有弄清的契丹早期钱是翻砂铸造还是模范铸造的问题给予一个可信的回答，对契丹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作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必将对契丹钱币的鉴别认定和断代考释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这批钱树主要出土于内蒙古通辽地区，少量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地区、吉林省榆树地区和辽宁省阜新地区。据了解，这几次总计出土了三四百株各种钱树，笔者获藏了其中的所有不重复品种，其余的已大部分流散到北京和东三

省、内蒙古收藏家手中。

本书总计收各种材料钱树266株，其中金钱树11株、银钱树27株、铅钱树18株、锡钱树8株、铜钱树202株。树形分为两侧各五枚对称型和中间枝顶一枚两侧各四枚型两种。树上钱币大多为小平钱，亦有折三、折五、折十数种。大辽时代23个年号（包括“寿隆”）均见小平钱树。西辽8个年号见有六个年号钱树，皇德、重德年号未见钱树。北辽3个年号均有钱树，东丹国时期有甘露元宝钱树1株、壮国通宝2株。后辽3个年号均见有钱树。

金钱树株株都是珍罕宝贵之品，其中遥辇汗国的“通行泉货”和东丹国的“甘露元宝”金钱树都是顶级珍品。银钱树中的“皇命太尉”、“天朝万岁”为珍罕之物。铜钱树中的大辽早期钱和辽亡后地方政权钱的钱树为珍贵品种。锡铅钱树多为印模母钱，但因多次使用，品相文字俱佳者少见，能称为美品者，价值应不菲。

本书是中国钱币史上的第一本钱树专题图书，也是唯一一部将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的钱币基本集全的钱树图书。这样完整的钱树谱系只有在视钱币如神物的契丹族政权里才有可能存在，也只有恰逢金元将契丹神物也视为自己的宝物的时候才有可能存在。

这里，衷心希望本书能给研究、收藏契丹钱币的专家及热心此道的朋友以有益的帮助和借鉴。由于水平所限，图片编选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及时赐教。

裴元博 陈传江

2009年10月24日于北京

序言

《契丹钱树鉴赏与投资》即将出版发行，这对当今钱币界，尤其对契丹（辽）钱币的收藏与研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由于时代久远、史籍缺佚、实物罕少等诸多原因，契丹（辽）钱币收藏与研究远滞后于其他古钱（特别是中原地区古钱）；不唯如此，这一领域还充斥着不少误解和歧说，为收藏者视作畏途。

裴元博先生毕业于辽宁大学，当过兵，从过教，编纂过地方志，并担任过多个企业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始专职担任辽宁省文物民间收藏研究会秘书长，长期从事流散文物的鉴定收藏研究的管理工作。工作之余他喜好收集契丹（辽）旧物，且以钱币为最，浸淫日久，领悟渐深，多有心得。近年来，裴先生以“泉痴山人”之名，在报刊及网上发表了数百篇有关契丹历史文化及钱币方面的专题文章，博得众多网上爱好者的赞誉和好评。应该说由裴先生主笔的《契丹钱树鉴赏与投资》是他多年来厚积薄发的一份硕果。

陈传江先生生长于晋北地区，占大辽（契丹）国西京之便，雅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钱币的集藏，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契丹文字，对契丹文字钱币、符牌及旧物的认识颇有见地，并将其集藏的契丹字钱币在网上示人，答疑解惑。裴、陈二位先生对契丹历史及钱币方面的研究可谓是“志趣相投，珠联璧合”，此书正是两位先生联手的成功之作。《契丹钱树鉴赏与投资》（以下简称《钱树》）一书有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广积大成，完整翔实。《钱树》内容广泛，涉及自古契丹部族（含大贺氏契丹部落联盟和遥辇氏契丹汗国）始，后经大契丹（辽代）、东丹国、北辽，再及西辽、东辽和后辽等不同时期（政权），历史跨度达数百年之久；囊括了契丹民族发展、强大和衰落的整个历史过程，其中很多内容是以往钱币类书籍从未论及的；近二百种样品均为著者自藏；品种齐全，金银铜铅锡五材俱备，年号、国号、行用、祭祀诸钱齐列，所有各契丹政权年号钱基本集齐。因此，《钱树》称得上是一部内容翔实的契丹钱树集大成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契丹钱币的通史。

其二，图文并茂，相互引证。钱币考证是重证据的，尤其是《钱树》这样一部详述契丹铸钱的专题类书籍，其内容广泛，颇具新意，故而对于历史的求证就更显必要。《钱树》按照年代顺序依次提供了不同时期（阶段）契丹所铸

钱树的原大彩色图片，并标明尺寸、规格、重量等，在增强本书历史真实感的同时还给读者以直观形象的感受；《钱树》还辅有诸如凡例、概述及各类资料，使图文相互引证，相得益彰，达到了很好的整体效果。

其三，史论结合，基础扎实。一本好的钱币类书籍需要大量真实的物证和充分可信的理据，两者构成了此书自身的价值。时下，钱币实物与相关理论结合得比较好的契丹铸钱史方面的书籍尚属阙如。裴、陈二位先生集自己多年的收藏与学养填补了这一“空白”，实为幸事。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很多基础开拓和理论创新方面的内容，值得称道的是《钱树》中“专论”部分的六篇论文，赋予该书很强的学术价值，可谓此书独具的价值所在。

从一定意义上讲，古代钱币学是一门“考证”学科，需要认真、求实的精神，这一点读者能够在《钱树》中感受和体会到。当然，就像所有古钱币书籍一样，本书也会面临着各种批评和评价，甚至一些质疑，这在学术研讨上是件很正常的事，毕竟一个新的理论或观点是需要长时间的辩论来最终确认的，更何况又是一个与八百多年以前契丹铸钱有关的历史话题呢？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认识与雅量。

李卫

己丑年寒月

凡例

一、本书图片及拓片主要以编者所藏实物进行拍照与捶拓，所收钱树均系契丹族政权铸造，有遥辇契丹汗国、大契丹（大辽）、东丹、北辽、西辽、后辽等主要政权的小平、折三、折五、折十钱树266株。

二、按金、银、铜、铅材料及政权存在年代顺序排列，拓片尺寸大小与原物保持一致。彩图只供欣赏鉴定时参考。

三、因铜钱树真品每株存世量都不足十株，金、银、铅钱树每株都是孤品，全部钱树都是国宝级大珍；所以全部品种不再分级，仅在以稀缺程度评定价值时区分。

四、钱树标价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定价标准以钱树本身收藏价值和稀缺程度为主，同时参考国内外拍卖市场、收藏品公司商店、收藏品市场同类商品价格定价。标价仅供广大钱币收藏爱好者和货币研究工作者参考。

五、本书钱树标价均以枝型完整、品相上等等为准，如品相绝美或较次，可酌情增减。

六、本书收编者撰写的有关契丹钱币专论数篇，供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契丹钱币的朋友们欣赏钱树实物时参考阅读，以便加深了解。

七、本书附录若干工具类图表，以便广大钱币收藏爱好者和货币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了解研究契丹钱币时参考。



目录 | Contents

契丹钱币简史

契丹金属铸币概述	2
契丹货币制度与经济政策	3
契丹族钱树概况	11
契丹族源探秘	15
前契丹时期	16
契丹帝国时期	25
后契丹时期	148
契丹帝国时期地方政权	162

契丹钱树的鉴定

契丹铸钱工艺特色	176
契丹钱币形制特征	181
契丹金、银钱树探秘	184

不同材质钱树价格参考

金质钱树	196
银质钱树	196
铜质钱树	197
锡质钱树	201
铅质钱树	202

附录：辽代度量衡制与公制换算

度制	204
量制	204
衡制	204
钱衡制	205
金衡制	205

后记	206
----------	-----

主要参考书目	207
--------------	-----

契丹钱币简史



契丹族自始祖奇首可汗投鹿侯于东汉安帝刘祜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诞生，至明朝初年（1400年前后）突然从古籍中消失，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约1286年。其间：契丹族经历了幼年的马逐水草，人仰湮酪的生活；青年时的金戈铁马，豪气干云的豪强；壮年时的都会百万，贡者如云的繁华；老年时的昏聩目眩，筋疲身软的悲叹。契丹族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绎了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波澜壮阔的豪迈正剧。契丹钱币发生发展的历史亦为契丹这一历史正剧谱写了一首余音绕梁的主题歌，它浑厚、苍劲、粗犷、雄壮的旋律，深邃、清新、精美、厚重的内容，为整个正剧增添了无比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以前不了解甚至误解契丹的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力和知识偏差，在真实的契丹面前折服赞叹。



契丹金属铸币概述

契丹金属铸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最庞大的家族。它的品种之多，贵金属币数量之多，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金属铸币可以分成年号钱和非年号钱两大系统。两个系统中都有行用钱和非行用钱。铸币材料除没有纸料外，金、银、铜、铁、铅、锡五金齐备，另有玉、石、陶、瓷、骨、木、玳瑁等非金属制币。既有巨如井盖、重达数百斤的“巨无霸”钱币，也有超小型的直径不足1厘米、重量不足1克的微型钱币。行用钱币形既有方孔圆形钱，也有银锭形铸币，更有长方形的钱牌，还有“钱中钱”这一空前绝后的奇异钱币。总之，中国钱币史上所有的古钱铸币品种，在契丹钱币中都可寻觅到，或承绪，或发端，或创新，五彩斑斓，美不胜收。

年号钱自太祖916年建元神册开始至保大五年（1125）辽亡的209年中，建立的24个年号（包括辽道宗太康、寿隆两个待考年号）均有铸币，而且均铸有折二以上大钱，并且金、银、铜三材同模同铸，有十余年号还铸有铁钱。除汉文年号钱外，目前已发现契丹文年号钱数十种，是否所有年号都铸有契丹文钱是有待出土实物进一步证实的问题。

不仅大契丹（大辽）政权建元必铸钱，而且只要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不管是中央政权、地方政权、起义政权，只要建立年号，哪怕是仅存在数月甚至数天，必定也会铸造年号钱。东丹、北辽、西辽、西北辽、东辽、后辽、后西辽无一例外，已知这些政权建立的17个汉文年号都铸有年号钱行世，而且都是五等钱制和金银铜三铸。受契丹货币制度影响，辽朝境内的其他民族，如渤海族、奚族建立的政权也是建国或建元必铸

钱。从目前的出土文物看，这些民族的所有起义政权都铸有年号或国号钱。

契丹非年号钱质量之高、品种之多、艺术水平之登峰造极为中国钱币之首。其中所有皇帝均铸并通行使用二百多年的“万岁三钱”（千秋万岁、天朝万岁、皇帝万岁）都创造了行用钱多个钱币之最。它的纪年钱、国号钱、国号年号一体钱都创造了中国钱币史上的品种数量之最。它的巡宝钱、长方形钱牌、政治宣传钱、钱银库计数钱，设计上的奇思妙想，制作上的别出心裁，使用上的深刻寓意，都令世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它的聘享钱、赏赐钱、祭祀钱将契丹人汉学功底的深厚，书法的精绝神妙，以及他们坦荡豪迈的胸襟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得不从心底由衷赞誉。它的民俗钱形制的雄厚厚重，内容的丰富多彩，制作的粗犷精整，设计的独具匠心都达到了当时钱币艺术的巅峰，受到所有收藏者的喜爱和追求。

总之，一千多年前深度汉化的契丹民族修政兴国，“锐意于治”，奋发图强，不断进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钱币文化，为中国钱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相信随着人们对契丹文明的不断认识，学术界对契丹货币经济的研究将会步入一个崭新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契丹货币制度与经济政策

铸币管理机构及管理方式

契丹铸币管理机构设置较早，据《辽史》支离破碎的资料推测，早在辽始祖涅里时代（即遥辇汗国阻午可汗时期，公元735—746年）即设有以下几种机构。

矿冶五坊——包括金、银、铜、铁、铅五坊，负责五金的勘探、开采、矿山管理、冶炼等事务。

制作八坊——包括军器、钱币、日用器、农牧器、上用器、车辇、器杖、祭礼器等八坊，负责兵器、农机具、日用器皿、宫廷用品、车辇器杖、祭器礼器的制作及国家钱币的铸造。

各坊设正副坊使，下设详稳司，设详稳、都监管理下属人员。在全国各地凡有金、银、铜、铁、铅矿可供开采之处设坑冶，置专业户民立寨设馆以专采炼，并依就近设坊的原则在坑冶附近或当地设置铸钱等坊。冶炼出的成锭运至国库，按计划用量拨付制作坊制作或铸造，成品验收合格后入库，按计划调付各部门或各地。

太祖、太宗时实行了“一国两制”——北、南官制。北面官中，北南大王掌管钱币管理，调拨储运，宣徽院管理矿山采炼及钱币铸造，太宗时曾在北面官中设五冶太师总掌契丹地域天下盐铁。南面官中，在汉人枢密院中设有户房主事，厅房即工部主事，协调户部事务。六部中的户部有专员掌管财业、盐铁、坑冶、钱帛、度支等事务。后又在东京设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在五京及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三司、度支诸司等派出机构，进一步掌控督管各地采炼、铸造、出纳、调拨、转运等事务。这些机构辽中期完善后，至其国亡一直运作正常。



契丹官吏和武士

在一般的史籍中，契丹是一个落后和野蛮的民族，其实契丹人参照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管理体制。

契丹的铸币权严格地掌握在皇帝和他依赖的执政班子手中，年号钱大抵在改号前一段时间就知会户部管理钱币的官员，由他安排工匠设计图样，让书家书写钱文，让雕工按样雕出钱样，呈送皇帝审阅，批准后，雕工按呈样用软材料雕出铸母发给户部直属铸钱坊（院），待铸出头炉钱再选样钱送钱法官审查，合格后将样钱和铸母颁发全国北南各铸钱坊全面开铸。

每种年号钱的铸量都由户部官员做出计划报皇帝批准，然后由宰辅根据三司使的预算下令拨付给各地转运使，转交各户部使司支付给各部门。北面官铸币除少设计铸样关节外，转运投放大体与南面官相同。



非年号钱大抵由户部掌管赏赐和民俗事务的官员根据国家节庆和礼仪及民俗事务需要，每年预先做个大体计划，列出待铸钱名称、钱样设计图、用料、铸造发行日期，报主管官员，再由其呈皇帝批准，然后按计划发行。其设计、铸造、发行均由户部直属机构和铸钱坊完成。



辽代古塔

此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当年的辽上京所在地，为双塔中的南塔。

契丹的铸币机构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是其一大特点。把国家钱币视为皇帝的“王信”，把它的政治作用看得高于经济作用，是契丹钱币铸行的另一大特点。铸币机构亦按北、南两个系统设立，应是契丹铸币独有的第三大特点。北面铸钱机构重在契丹和部族地区铸行民族特征强烈的钱币，如契丹文钱、政治宣传用钱、民俗用钱、祭祀用钱等；南面铸钱机构重在铸行一切和经济有关的钱币，如仿铸周边汉族政权的钱币、制造和中亚各国的贸易用钱、国家法定行用钱等。

契丹的铸币机构和管理方法学自唐朝，经几百年的消化吸收，到帝国建立时，已然是出师多年的行家里手。五代时，它的铸钱机

构和管理方法有的地方已经超过中原地区。夏、宋、契丹三足鼎立时期，契丹的铸币机构和管理方法也不落后夏、宋。

货币制度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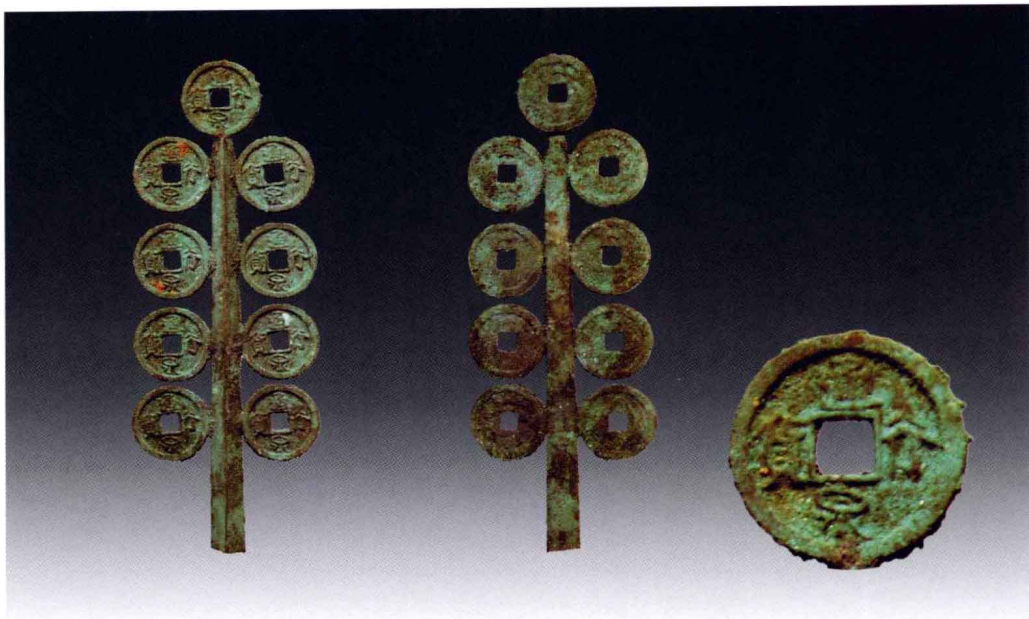
契丹钱币铸造，发端于耶律阿保机之父耶律撒剌时期“通行泉货”的铸行。此前虽

有不同时期不同钱名的仿铸、试铸的契丹风格明显的零星钱币存世，但因实物过于稀少和史实资料阙如，无法对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货币制度进行有说服力的考证。待出土实物再丰富些，史料的发掘能获得新的有益的资料，再对它们进行探讨研究。

耶律撒剌时期“通行泉货”系统钱币的铸行，标志着契丹族已正式进入货币经济时代。“通行泉货”具有流通货币的全部特征：因多次连续铸造形成多种版别（目前已发现

“通行泉货”十三种版别钱）；为适应货品交易状况，制造有不同等级的货币。目前已发现“通行泉货”钱不仅有小平钱，而且还有折二型、折三型钱币传世。至于有没有更大等级钱币铸造，尚待今后进一步考古发掘。铸造的行用钱已达一定数量。目前已发现的“通行泉货”钱总数应在数百枚左右，按存世钱与湮灭钱惯常比例1：100000/千年计算。当时“通行泉货”铸造总量应在数万贯，其钱开铸于公元842年耶谟可汗屈戌时期，如其在907年停铸，前后就应铸了六十多年，每年平均不过铸了几百贯而已。这个推测结果符合当时契丹国土方千里的经济规模。

契丹国是个农牧业并举的国家，各地区



“通行泉货”背上俯月小平铜钱树

契丹遼挾汗国时期铸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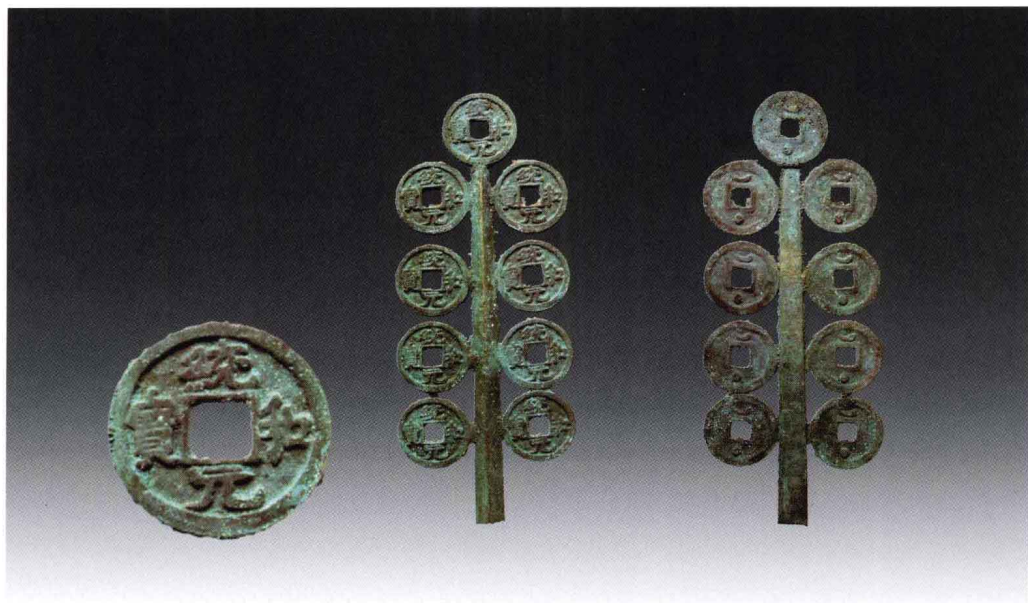
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尽管耶律撒剌时期以发行“通行泉货”钱为标志，说明契丹国已正式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但“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在偏僻地区依然存在。契丹的货币制度与政策长期以唐朝为榜样，基本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唐朝“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与政策，只是在和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后，财政有了长期固定贡银收入，契丹境内金银冶炼有了长足进步后，才改为“银钱同行”的货币制度与政策。契丹铸钱史并依此两种货币制度与政策，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钱帛兼行”和后期的“银钱同行”。

“钱帛兼行”时期

自唐朝初年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的近五百年间，契丹族实行的都是“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和政策。布帛（绢、绸、缎、罗、纱等丝棉纺织品，甚至包括棉花）天生的不宜破碎的特点使它在经济生活中始终担

当着主币的角色，而铜钱天生细小的价值特点使它只能在经济生活中始终担当着辅币的角色。布帛在这五百年中始终是契丹社会商品交换中的主要媒介，铜钱只起到找零补缺的作用。

契丹统治者十分重视布帛的货币职能作用，并把稳定币值作为基本国策。《辽史》中多次记载了皇帝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布帛质量的史实。辽圣宗统和三年（985）十一月，朝廷颁布命令：“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67年后，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七月，辽朝廷为加强对货币的制造、使用、调拨的管理，特意在长春州增设了“钱帛司”，以就近对铸币和布帛进行管理，从中可以看出辽政府对布帛货币的特殊重视。85年后，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三月，又颁布了一道“禁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的敕命，严肃地强调了作为特殊商品的布帛的交易媒介的货币地位及其在商品交换中的比价作用。



“统和元宝”大字背上下星小平铜钱树

大辽国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统和年间铸造。

“澶渊之盟”签订，契丹在获得了1500万两宋贡银后，辽道宗于大康七年（1081）十一月，下达了“废除绢帛尺度狭短之命”，结束了施行五百余年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和政策，揭开了“银钱同行”货币制度的新时代。

契丹在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和政策的同时，在不同地区还实行了灵活的货币政策。如在偏远落后地区长期允许使用其他实物货币，像马、牛、羊、日用生活品、粮食等，政府对这些实物货币进行指导定价。在南京、中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大额商品交易中始终允许白银称量货币的使用，辽朝皇帝还带头使用白银。注重发展经济，稳定币值，因地制宜，灵活制定政策，这些都促成了辽朝货币制度和政策向更高级的“银钱同行”的货币制度和政策的转变，并使契丹的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整个辽代物价相对稳定，物质储备极其丰富，这在整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也是一个令人刮目的奇迹。

“银钱同行”时期

契丹使用金银铸币非常早，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仿铸汉代的契丹风格明显的“小泉直一”钱中，就发现了金质钱。在历代契丹仿铸钱中都曾发现金、镏金和银质钱。它们混杂在大量行用钱中出土，说明它们曾被用于流通行用。契丹帝国建立后，金、银钱的铸造形成制度，成为国家正常金属铸币的一部分，在铸造铜钱的同时就必须铸造金、银钱。

契丹金银铸币品种之多、数量之巨都创造了中国钱币史之最。这不仅是契丹赏赐庆典较多的缘故，而且是由中亚拜占庭、大食、波斯、回鹘等国巨额贸易的需求决定的。契丹境内之所以金银锭发现和出土都极少，原因就在于契丹把大部分称量的金银货币都变成了对中亚贸易的金、银钱。这是契丹“银钱同行”货币制度和政策有别于宋朝的一大特点。

契丹国内自唐以来就通行金银称量货币，但自从与中亚各国的贸易逐渐加大后，国



内使用金银称量货币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少。

《辽史》明确记载使用银称量货币的史实仅两条，而且都发生在辽穆宗在位时期（951—969）。

应历十六年（966）正月，穆宗“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应历十八年（968）元宵节，穆宗在上京观灯，曾“以银百两市酒，命群众亦市酒，纵饮三夕”。这两件事说明，在契丹经济生活中称量货币早已被广泛使用。由于大量的赏赐和物资交换，掌握在官方手中的称量货币和金银铸币大量流入民间，促进了“银钱同行”货币制度和政策的实行。而在与西亚中亚的贸易中，契丹人亲身感受到使用金银铸币的方便，这给了契丹人积极的启示，他们不仅加大了金银币的铸造量，而且减少称量货币的使用与投放。

传世和出土金银铸币总量多于称量货币的事实，说明契丹的“银钱同行”货币制度和政策不同于周边国家，契丹金银铸币的国内流通数量高于称量货币，国外行用额也高

于周边国家。这恐怕是契丹“银钱同行”货币制度和政策的最大特点。

铜铸币历来是汉族政权经济生活的主要的第一位的货币，而契丹无论实行“钱帛兼行”还是实行“银钱同行”的货币制度，都把本国铸币视为传达王命的圣物，把钱币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把钱币的政治作用看作主要的第一位的，而把经济作用看作次要的第二位的。他们宁肯花费大量宝贵的资源和人力去大量仿铸周边国家和主要敌对国家的钱币，而不愿扩大本国铸币的铸造量。他们宁肯花费大量宝贵的资源和人力去铸造非经济用钱币，而不愿扩大行用铸币的铸造量。他们宁肯花费大量宝贵的资源和时间去精雕细铸政治宣传用钱、祭祀用钱、聘享用钱、民俗宗教用钱，而不去精雕细铸经济行用钱币。契丹人这种独特的铸币理念和做法，在中国乃至世界钱币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从出土的契丹窖藏钱币中可以看到契丹本国铸币仅占很小分量，加上近几年被探



“应历通宝”背上星小平铜钱树

大辽国穆宗皇帝耶律璟应历年间铸造。